

# 明清回族经堂教育活动刍议

刘京京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回族经堂教育发端于明代晚期, 勃兴于清代。明清时期的回族经堂教育具有拜师入寺程序严格、教育管理活动刚柔相济、习经生活节奏单一等特点。该时期的经堂教育活动培养出了大批经师学者、提高了回族人民的文化道德水平、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增强了回族群体意识, 但也带有与时代文化、科技等相脱节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 明清时期; 回族; 经堂教育; 教育活动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 (2014) 01-0034-05

回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 也是一个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民族, 有着自己悠久灿烂的教育历史, 也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教育形式。经堂教育是伊斯兰教教育制度与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相结合的一种教育形式。它是指在清真寺里, 由开学阿訇招收穆斯林子弟, 学习伊斯兰经典, 传授伊斯兰教教义、教法等基本宗教知识, 培养宗教接班人和穆斯林专门人才的特殊教育制度。<sup>[1]</sup>经堂教育对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价值观、人生观乃至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有着重大影响。因此, 无论是研究回族教育的历史还是现状, 都不能回避经堂教育, 都不能不研究经堂教育。<sup>[2]</sup>

## 一、发展路径: 明清回族经堂教育的发端与勃兴

回族的经堂教育兴起于16世纪末的明代晚期。它的活动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心理条件全面具备之下开启的。

首先, 在社会方面, 历史上随着回族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分布地区的日益广阔, 清真寺数量大增, 随之而来的是需要大批的宗教职业者主持教务,<sup>[3]</sup>致使传统的父传子承的教育方式不能满足伊斯兰宗教职业的需要。正如《经学系传谱序》中所言“吾教自唐迄明虽有经籍传人兹土, 而其

理艺难传, 旨义难悉, 故世代无一二精通教理之掌牧, 以致多人落迷途, 漫漫长夜而甘醉梦之不觉也。”<sup>[4]</sup>

其次, 在经济方面, 勤劳聪慧的回族人民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奋斗, 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诸多回族上层人士和穆斯林捐赠钱财兴建清真寺并支持经堂教育。再次, 在心理方面, 明中叶实行海禁以后, 来华的穆斯林学者逐渐减少, 于是出现各教坊掌教和经师严重缺少的现象。在中国穆斯林中, 掌握阿拉伯文和波斯文, 并能熟练释读经义之人愈来愈少。同时, 穆斯林的宗教信仰逐渐式微, “倘有教门之家, 尚存三分回辉气象, 如无教门之家, 纯变为汉教矣”。<sup>[5]</sup>面对“教道久湮, 人心厌弃”的严酷现实, 回族开始探求伊斯兰教的立存之道。

最后, 在清真寺的社会地位方面, 清真寺是当时穆斯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清真寺兴办教育, 可以依托宗教的名义收取经费, 借以解决师生的食宿问题。加之教师是由寺内阿訇担任, 可方便教授宗教知识, 维护清真寺的核心地位。在以上社会、经济、心理等背景之下, 经堂教育便在明后期应运而生。经堂教育这种较为正规的教育形式的出现, 有效的保证了散居全国各地的回族穆斯林信仰的坚定和纯洁, 从而扭转了

收稿日期: 2013-07-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度规划基金项目(12YJA880096); 2012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2-0873);

国家社科基金2013年一般项目(13BZS099)

作者简介: 刘京京(1984-), 女, 河北沧州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教育史。E-mail: qsdliujing@126.com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衰微局面。<sup>[6]</sup>

胡登洲作为回族经堂教育的奠基人,对经堂教育的开办与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他因目睹伊斯兰教“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现状,“慨然以发明正教为己任”,立志办学。他将伊斯兰教的教育制度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形式相结合,开创了经堂教育之先河。起初办学之时,他在家收徒讲学,实行半工半读。后来在清真寺办学,半靠施舍,半靠供给。学员自愿入学,采取工读的办法,生活以自费为主,清真寺给予补助,“农忙作庄稼,农闲做满拉(学员)”。<sup>[7]</sup>他卒先改革口头传授教义的传统方法,提倡经堂教育制度。在陕西地区清真寺内招收学员,讲经授业,注意研究宗教哲学,注重讲授阿拉伯文经籍著作。后逐步发展成为经堂的陕西学派。<sup>[8]</sup>胡登洲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经堂教育蔚然成风。<sup>[9]</sup>

清朝是经堂教育发展的繁盛时期。经堂教育自胡登洲在陕西首创之后,发展至清代,在陕西、河南、山东、安徽、云南等地区,因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不同,在不同地区形成风格各异的学派。如“精而专的陕西学派”,这一学派的教者和学者都专攻一门,如学者还要兼学另外一门,须另有老师讲授。以伊斯兰教学者常志美为代表的“博而熟的山东学派”,设帐讲学,广收弟子,培养出一批著名经师。常志美学识渊博,波斯文造诣颇深,著有波斯文语法书。他兼授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授徒众多。此学派的教者和学者都不必专精一经。清中叶,“中阿并授、诸科分进的云南学派”在回族学者马德新、马联元的倡导之下,形成自己的特色。马德新为改善经堂教育,翻译了一批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典籍,马联元倡导中阿并授,翻译《古兰经》的选本《亥听注解》,要求学生既通晓伊斯兰教经典原文,又善于用汉语阐述教义。他还编写简易的《阿拉伯文法》《波斯文法》,以适合中国穆斯林学习。<sup>[10]</sup>

## 二、图景展现：明清回族经堂教育活动探析

经堂教育是伊斯兰教育制度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教育活动独具特色。其教育活动带有拜师入寺程序严格、教育管理方式刚柔相济、经生习经生活节奏单一等的

特点。

### (一) 严格的拜师和入寺程序

穆斯林家庭的儿童接受完启蒙教育之后,如愿进一步接受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他们则要请一位清真寺中有“阿林”(学问)的阿訇作为自己的经师,拜其为师。拜师仪式是学生向老师下跪拿手,老师端坐不动,接受此礼,于是开始了师生关系。如果老师拿手时表示客气推辞,那便是不承认这个学生。被老师接受下来的学生便是海里凡,或经生。从此他们便开始正式的经堂生活。<sup>[11]</sup><sup>525</sup>一般投学经生要有名人担保,经所投阿訇考核和经学所在寺管会同意,有的经堂还制订一套规则,进行考核。如赵灿在《经学系传谱》中记录舍蕴善收录经生的五条原则:一是对英年寻学者,先观外貌,以定其格(清秀、愚拙、刚介、狡诈);再验言辞,以分利钝;继询经句,以定水平;俱予收录,因材施教;二是对年愈三旬的寻学者,则迟授以经,察其晨昏勤惰,果系发奋务学,方与授经。否则,虽有荐书,也要婉言辞去;三是对年事已四旬的寻学者,再迟其授而察之,果勤师教礼,弃撇尘纲、潜学慕学、炼性习道,方与授经。否则,纵有荐书,也善辞不收;四是对年纪太幼的寻学者,除有至亲父兄同寓者外,不予收录;五是收徒本“宁存愚而多诚者,不收智而多狡者”的重德原则。<sup>[12]</sup><sup>142</sup>由以上资料可知,进入经堂学习需要通过阿訇严格的考核与筛选。

### (二) 刚柔相济的教育管理活动

经堂教育的管理主要包括教师管理与学生管理。在教师选聘与管理方面,教育者泛称为阿訇,在甘、青、宁一带穆斯林中,又多称为开学阿訇,经生对其尊称为“吾斯达德”(即师傅)。如果一个清真寺既设有经堂大学,又设有经堂小学,开学阿訇则担任大学教师,另有“二阿訇”或“小学阿訇”担任小学教师,如果一个清真寺只设有小学和中学,其教师也就是开学阿訇。开学阿訇一般实行聘任制,海里凡在经堂大学“穿衣”(即毕业,北方为“挂璋”)后,就会被别的中小清真寺聘用,作为该寺的开学阿訇,这些阿訇在自己开学过程中继续深造,有的继续老师的学派,有的自行钻研,往往变成为精通某一门学问如《古兰经》、注疏学、伊斯兰神学、伊斯

兰法学或阿拉伯、波斯文学等学问的专家。<sup>[13]227</sup>在一些古老的清真寺内,不仅设有开学阿訇,还有掌学阿訇。掌学阿訇是开学阿訇的教学助理,协助开学阿訇为清真寺经文大学讲授经课。在一些较大的清真寺里,主持经堂教育的阿訇不仅人才济济,且都品学兼优,甚至出现被“抢聘”的对象,而那些学问、品德较差的阿訇则会受到冷落。在经堂教育中,清真寺具有决定是否聘任某位阿訇的权力,致使经堂教育中阿訇的流动性较强,一位阿訇在其一生的教学生涯中可以受聘于多个清真寺,执教于本地、外地甚至外省。如明清之际陕西咸宁伊斯兰著名经师冯少川,为胡登洲的二传弟子,先后在南京、开封等地设帐讲学。<sup>[14]93</sup>

经堂教育的学生管理。经堂教育通常包括小学部和大学部,有的包括中学部。小学部作为启蒙教育,主要教授儿童简单的经文和宗教知识。学生入学、退学自由,学生不分班次级别,随来随学,无严格的学习期限。学完规定的课程之后,学生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进入大学部继续深造。在大学部,同样有着游学的传统,即念经求学者可以负笈远游。一种情况是,他们先在本地跟随一位教师或先后跟随几位教师学习,之后则慕名投奔到远方名师门下进一步求学深造,另一种情况是,经堂学员跟随老师到处流徙,直至老师认为可以毕业“穿衣”为止。<sup>[13]226</sup>如清初青海西宁著名经师李定寰幼年于本坊习经,后闻冯少川弟子把师于河州授徒,乃往河州受教。<sup>[14]94</sup>

学员在大学部的学习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在学习期间,有的学员发现自己达不到要求,可以选择中途辍学,改就他业,称之为“改行”;有的学员攻读完全部课程,大学部择期为其举行“穿衣挂帐”典礼,意为学成毕业。然而,经堂教育也不是绝对自由,学员行为也受到一定规范。经堂明确规定经生不得著绸缎一类价昂的衣料,不得进娱乐场,不得吹拉弹唱,不得告假外出,入夜始归等等。经生除听讲经典之外,还要应坊上教民之请去作很多繁杂的事(称“杂使”),如婚丧、宰牲、游坟之类的事情。<sup>[11]526</sup>

### (三) 节奏单一的习经生活

一个穆斯林家庭的儿童,很小就要开始到清真寺念经(即念“小学儿”),接受伊斯兰教的

启蒙教育。这些儿童一般是早晚(有的是一日一次,即哺礼后宵礼前,昏礼及昏礼后稍作停顿)到清真寺接受“小学”的教育,教和学的地点相当随便,可在讲堂里,也可在大殿廊下,教师的住所,或在大树荫下。教授的方法和学校体制是私塾式的,大致是教师念,学生跟着随读,或让学生念,老师在旁纠正。<sup>[11]524</sup>以上是较为单一乏味的启蒙阶段的习经生活。

在完成启蒙阶段教育,正式进入经堂教育,其读经、习经生活则是别样一番活动场景。经堂中的学生人数较少,少者几人,多者也不过二三十人,加上师资有限,没有统一的课程计划和教学进度,无法进行分班教学,只能实行混合编班制,不同程度的经生一起上课,由经师逐字逐句地讲授。经生一日的的生活安排大抵是每日照例参加五时礼拜,在晨礼后即赴讲堂听讲,一般都要连续听二至三个小时,有时晨礼后讲堂黑暗则要燃灯听讲,经生下堂之后要自己再回忆温习一下当日听受的功课,才可休息一下和进食午餐(指一日三餐者)。午后晌礼后则继续听课,或由经生向经师诵其午前所听课程。有的向经师求解疑问,有的三五一组相互讨论。有学力较优的经生代表老师(由老师指定)向学力较次的经生重授当日所讲的课程。至哺礼之后则才可自由休息些时候。到昏礼和宵礼之后,则要朗诵当天的课程和预习次晨的功课。<sup>[11]526</sup>

经堂教学沿袭中国儒学私塾学习传统,要求经生对经书要背诵如流,“凡接《法期里》谕经,命每授之章,先诵字二百遍、兼讲读其文,又三百遍。次早接经……凡接《萨尔夫》三种,并《米苏巴哈》《曼推格》请经,惧限背熟……凡习《遭伍》以上之经者,日诵三十遍,为下功”。<sup>[15]</sup>同时,还要求将读与写相结合,由经生征引有关典籍对所学经书进行注疏诠释,俗称“狭经”。

授课期间除了抓紧平日复习提问之外,还规定严格的考试制度,大考小考相结合:“次早受经,或考昨日所读字义文风中之难者,命对面背之,兼论其义……有月考试,亦一妙法也,于数日前悬牌学门,标写某日听考。诸生是日持习过各经,齐集讲堂。叙次呈现经于案,随意抽取某经某篇,使之讲,中有生疏者,或责之,或罚之……”。<sup>[15]</sup>以上生动形象地描绘出经生日常习

经及考试生活景观。

### 三、价值体认：明清回族经堂教育活动评价

从经堂教育内容上看，经堂教育是一种伊斯兰教宗教教育制度，在其办学形式与特点上，它大量吸收了中国私塾教育的特征，是伊斯兰宗教教育制度与中国社会文化制度相适应的一种民族教育形式。回溯回族经堂教育活动，已历400年的历史进程，凸显出其顽强的生命力。明清经堂教育的开启与勃兴，对中国穆斯林文化的延承及发展，具有极为深远之影响。

#### （一）经堂教育活动培养了大批经师学者

“先生（指胡登洲）溥以待众，菲以奉身，但教道久湮，人心厌弃，因其习学之难，得味之不易，故中道而止者众。其中之拔萃者，冯、海二先师，少尽其学，迄今百有余载，学业相承，代不乏人，幸矣，吾清定鼎以来，学者之众，人才之盛，宛如列星。”<sup>[4]2</sup>穆圣在传播伊斯兰教时就倡导：“求知是穆斯林的天职”。<sup>[16]</sup>胡登洲开创经堂教育先河之后，人才辈出、群星闪耀。其中不乏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者，有的担任某一派别的领袖，并且成为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这些经师学者为维护民族生存，振奋民族精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 （二）经堂教育活动提高了回族人民的文化水平和道德素养

明清时期，虽然设立了一些社学、义学和书院，但对回族人民的影响范围较小。而经堂教育不仅是培养宗教人才，为了使回族人民更好理解经文和教义，在普及宗教知识的同时，开设语言学、语法学、修辞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课程，希冀不断提高学员的汉文知识水平。此外，经堂教育通过阐释和解读伊斯兰教的教义，不断向人们灌输宗教伦理观念和伦理文化，如行善止恶、洁身自好等伦理观念，这些伦理观念内化为回族人民的行为准则，从而提高了人民的道德水平。

#### （三）经堂教育活动促进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在经堂教育兴起之前，中国伊斯兰教的阿訇多由阿拉伯、波斯等地方的学者担任，经堂教育兴起之后，培养出大批本土伊斯兰教学者。在经堂教育中、成长并成熟起来的大批经学家，如王岱舆、马注、马德新、马联元等，掀起的“以儒解回”的汉文译著浪潮，改变了原先“教义不彰，

教理不讲”的状况，方便了回族内部运用汉语文学习和掌握伊斯兰教知识，促使伊斯兰教在中国扎根、发展，而且这些著述有利于教外人士了解伊斯兰教，打破伊斯兰教与儒、佛、道长期隔阂的局面，有利于广大回族与其他民族间的交流。

#### （四）经堂教育活动增强了民族意识，促进了民族团结

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sup>[17]</sup>由于明清统治者对回族的歧视和同化政策，使得回族的民族意识更为强烈，民族心理更为强化，宗教感情更为深厚，而经堂教育活动的创设，恰恰迎合了回民族的各方需求。通过经堂教育这一信仰方式，把分散于全国各地，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凝聚为一个坚强的共同体，从而达到了“天下回回是一家”“回回党护族类”等群体观念和整体意识的成熟及自觉。<sup>[12]148</sup>

诚然，经堂教育活动也并非完美无瑕，也有其局限性及消极影响。如经堂教育逐渐与汉文化脱节，与现当代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脱节，与变化了的时代脱节，与科学文化脱节，与普通技能、应用教育脱节，甚至把经堂教育这一宗教性质的教育绝对化为穆斯林的一切教育，带上了深深的历史和时代局限性。加之学制及升级制度的不完善，影响了科学教育教学质量的普遍提高和自身更新能力的滞后。<sup>[18]</sup>总之，对于回族经堂教育活动，应对其进行合理继承与扬弃，要积极吸收它的精髓部分，如刚柔相济的管理原则及游学传统等，对今之教育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 参考文献

- [1] 高占福. 伊斯兰经堂教育与回族社会的关系[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8: 103.
- [2] 马明良. 回族经堂教育之得失及其出路[J]. 回族研究, 1998(4): 70-76.
- [3] 丁宏. 析回族经堂教育[J]. 民族教育研究, 1992(1): 71-75.
- [4] 赵灿. 经学系传谱[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5] 马注. 清真指南[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435.
- [6] 张哲. 试论明清时期回族文化特质的形成[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 7-9.
- [7] 韩达.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第1卷[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 37.

- [ 8 ] 顾明远. 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193.
- [ 9 ] 秦惠斌. 从经堂教育说开去, 胡登洲四百周年忌辰感言[M]// 伊斯兰文化研究,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8: 55.
- [ 10 ] 何其敏. 中国明代宗教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21-122.
- [ 11 ] 李兴华. 中国伊斯兰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 12 ] 马平. 简明中国伊斯兰教史[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 [ 13 ] 冯增烈. 明清时期陕西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1.
- [ 14 ] 张学强. 西北回族教育史[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 [ 15 ] 纳国昌. 经堂教育的历史记载——《经学系传谱》浅析[J]. 中国穆斯林, 1996(4): 33-37.
- [ 16 ] 米寿江, 尤佳. 中国伊斯兰教简史[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151.
- [ 17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3: 105.
- [ 18 ] 赵振武. 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M]//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 下册,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948.

## On Mosque Education of the Hui Nationali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U Jing-jing

( School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

**Abstract:** Mosque education of the Hui Nationality originat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flour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ict temple entry, hard and soft management, and tedious learning rhythm, etc. The current research concluded that the education cultivated a large host of scholars, advanced the Hui people's culture and ethics, and promoted the sinolization of Islam and the group consciousness of Hui Nationality, despite its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ut of line with the cul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ose days.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i Nationality; Mosque education; education activities

( 责任编辑 周 密 )